

本集刊为中国知网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

广西大学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八辑)

主编：罗选民

08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八辑)

主编：罗选民

08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第八辑 / 罗选民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3683-3

I. ①亚… II. ①罗…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7540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倪雅莉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2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9.00元

产品编号：083995-01

主办单位 / SPONSORS

广西大学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编 / EDITOR IN CHIEF

罗选民

副主编 / ASSOCIATE EDITORS

张旭 李伟荣

主编助理 / EDITORIAL ASSISTANT

李文婕

编委 / EDITORIAL BOARD

Anthony Py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Bao Chuanyun,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USA
Edwin Gentzl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USA
Frank Austermuehl,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Henrik Gottlieb,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Isabelle Rabu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France
Jeremy Munda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Lawrence Venuti, Temple University, USA
Luise von Flotow,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G. Watson,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hrae Chittiphalangsri,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Robert Nea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Vicente Rafa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Xie Shaobo,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Zheng Bingham, Durham University, UK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单德兴, 台湾中研院
孙艺凤, 香港岭南大学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仲伟合, 澳门城市大学

编者的话

本集刊是《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第八辑，共收录 21 篇主旨发言和论文，被归入六个栏目，分别为：“第三届国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主旨发言选登、理论探讨、案例分析、中译外研究、译者研究、研究生沙龙。

2018 年 12 月，在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本集刊编辑部协办的“第三届国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上，来自作家界、翻译界以及评论界的国内外嘉宾所做的大会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回应与思考。一些来自翻译研究学界以外的发言者们立足于各自的实践经验与观察，给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这个论题带来了新颖的观点，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这些发言与本集刊一贯倡导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十分契合，因此本集刊特别辟出一个栏目选登了几位具有不同职业背景的发言人的主旨发言。由于其中大部分发言人并不从事翻译学术研究，因此并未要求发言人严格按照学术格式修改其发言稿，也不要求其文章遵循绝对的学术规范。在我们看来，学界同仁们尽可将这些发言稿作为研究的语料与对象，通过它们来观察同处于翻译社会活动中的其他施动者们对于文学外译活动有着怎样的认知与感受。

“第三届国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主旨发言选登栏目中收录了五篇发言。其中翻译家林少华的发言以村上文学及其翻译为中心，探讨文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林少华认为，二三十年来村上的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传播，除了故事有趣，还在于文体的力量。村上春树的文体不同于当今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形成了独特且难以模仿的“村上体”，因此村上文学的翻译也应重构村上的文体之美。原中国文学出版社副主编、中央编译局译审吕华在题为《对中国文学外译现状的一点思考》的发言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回顾了中国文学外译行业的发展历程，并从作家层面、官方层面及出版实体层面对中国文学外译行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是以西方汉学家们为主角，而本土的对外翻译人员几乎被全盘边缘化。吕华认为，西方汉学家和本土翻译家各有优势，应使两者相互取长补短，避免因误解产生误译，并论述了培养本土文学外译人才的重要性。作家张翎在发言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移民现象而产生的移民文学，或者说离散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界关注的话题。2000 年至今，近 20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多位都有移居经历，如高行健、多丽丝·莱辛、让·勒·克莱齐奥等。移居的传统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也一直存在，而海内外移民作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写作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他们的故土的，地理的阻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审美距离。张翎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中国文学外译浪潮中具有特殊性，他们虽已移居国外多年，却选择用母语写作，他们的文学轨迹与移居国并无太大交集，因此很容易陷入被出生国和移居国都忽视的尴尬境地，因此张翎希望这个特殊群体能得到更多关注。作家裘小龙则在其发言中探讨了双语写作与翻译的相似及相异之处。裘小龙通过以诗歌翻译和“陈探长”系列小说创作中的中国饮食意象等内容为例，指出双语写作不是简单地在忠于原文意义和意象的前提下翻译，而是要把一种语言文化特有的感性体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再现。注重、凸显译文或目标文本的语言感性是双语写作的策略，要通过糅合不同语言的感性使文本的语言更加丰富。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双语写作会通向更广阔的文化理解和交融的地平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加州大学驻华学习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座教授张敬珏(King-Kok CHEUNG)的主旨发言指出，对金庸作品的研究应将对“武”的注意力转移至对琴棋书画这“文人四友”上，将“文”视为金庸对“武”的想象的起源，这将为作家、翻译家、批评家探究金庸作品的哲学基础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理论探讨栏目中收录了白立平和汪宝荣的两篇论文。白立平在《中国文化外译中的赞助人与专业人士问题研究》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文学外译中的赞助人与专业人士问题。白提出，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白将之定义为译者以外的专业人士，包括评论家、编辑等）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包括独家机构赞助、个体赞助以及联合赞助等。以“中国现当代文化经典文库”为例，白探讨了赞助人与专业人士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中外赞助人、专业人士和译者之间的合作是确保翻译质量以及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将中国文化资本输出至英语世界的过程中，这样的合作将比以往更加普遍且富有成效。汪宝荣对过去十年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并以之为据对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题论文集《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了评论。汪指出，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虽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有待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很大。过去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较多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或综述，而缺少对社会与翻译及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进行理论模式建构和反思性批评，且大多研究仅采用了一种理论并相对缺乏实证研究。汪对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的述评对改进、提升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应加强原创性、实证性研究，并结合中国翻译实践进行理论构建。

案例分析栏目共收录了三篇文章。冯全功、刘佳盈对比分析了杨宪益、戴乃迭

合译《红楼梦》的期刊版和全译版，探讨了杨译《红楼梦》前后改译的具体文本表现、动因和效果。经过对比分析，冯、刘发现杨、戴进行改译的动因主要有三：一是与《红楼梦》原文底本的选择有关；二是受当时外部政治环境对译者的影响；三是译者对文本自发性的修订，且其中译者的自发性修改数量最多。杨、戴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九回期刊版《红楼梦》译文长久以来受到忽视，冯、刘的研究有助于学界对杨译进行客观评价，也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有益探索。曾光以王尔德《四时之爱》一诗中的修辞翻译为例，论证了修辞手法的完全翻译是不可能的。曾光引入了关于语境的讨论，认为语境是一个同时具有“边界”和“核心”的存在。越是处于语境中心的部分就对应着越高的翻译难度，处于边缘的部分则较容易翻译，而修辞就处于语境的中心地位，难以轻易地被放置于其他语言的相应位置中。曾光对语境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诗歌修辞翻译为案例的研究是一次较为新颖的尝试，其对于语境理论的阐释值得感兴趣的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案例分析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巍巍和穆雷。王、穆从翻译专业人才抽样调研结果出发，分析了我国翻译人才发展现状、问题与需求。调研发现，我国翻译人才队伍正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人数总体逐年增长，且社会对翻译工作的认可度逐步提升。但翻译人才对当前的工作满意度普遍较低，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地位和工作强度两个方面。据此，王、穆认为我国翻译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在于翻译行业人力资源概念有待更新、翻译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有待加强、翻译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有待完善。针对以上问题，王、穆从国家层面战略规划、翻译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行业社会认知、语言服务质量监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王、穆的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建设一体化的翻译人才培养、储备及质量保障体系，以满足国家新型发展战略对国际人才的重大需求带来了一定启示。

中译外研究栏目共收录了三篇文章。梁燕华从本质、记忆复原程度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海外汉学回译实践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在回译过程中可能出现记忆再现、记忆残缺和记忆消亡三种复原程度和效果，而回译者的符号媒介转换能力、中华文化认知能力、文化记忆再生产能力都会成为影响海外汉学文化记忆回译的因素。梁从文化记忆视角对回译现象进行的探讨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身份的认同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苏鑫的《译介学视角下区域文化对外译介研究——以沂蒙文化为例》一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以译介学为视角探讨了区域文化的对外译介模式和翻译实践。作者认为作为区域文化的沂蒙文化是完整的文化链，既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又凝聚和熔铸了革命传统和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现代意识，具有丰富多元的内涵。苏鑫指出，

区域文化的对外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体现，应该在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上开展广泛的翻译实践，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同时，区域文化的译介还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功效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支撑。苏鑫对于区域文化对外译介的研究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探索。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来自周成龙、崔司宇。对于汉学家和本土译者谁来充当“走出去”的译介主体是曹明伦、许渊冲两派争论的焦点。许渊冲获得的国际认可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周、崔将其视为一种相对成功的译介现象看待，并对此加以考察。他们认为，许渊冲翻译理念的核心为“优化”翻译理论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即目的语读者意识以及对“走出去”目的的认识。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翻译革除了传统异化策略的弊病，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流露出了多元文化主义意识，是一种“反思性异化策略”。许渊冲在中国文学外译方面所做出的在量与质两方面的成绩使得其成为外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他作为一个“自觉”的译者，也总结了一系列文学外译的原则与思想。因此，对于许渊冲翻译实践与思想的研究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译者研究栏目收录了三篇关于中外译者的研究论文。杨文地的研究对象为汉学家丹尼尔·贾德纳。他注意到贾德纳所具有的译者、历史学家、高校教师、汉学家的多重身份，并以此为视角探究各种身份对于其在翻译《中庸》时的策略及翻译技巧的选择。杨认为，贾德纳在翻译过程中不仅翻译了《中庸》文本，还自觉地选择了翻译朱熹的注疏并添加了自己的评论，从而将中国读者的阅读语境移植到译语中，让译语读者自我感受源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并有机会了解源语注疏者和译者的阐释性洞见。这样的翻译策略显然受到其教学目的的影响，也受到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身份的影响。费小平将目光集中在了对口笔译双料翻译家张闻天的研究上。张闻天不仅是优秀的口笔译双料翻译实践者，也是杰出的翻译工作领导者，但其成就却为国内翻译界所忽略。费小平将张的翻译生涯根据其生平经历分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美国伯克莱留学时期、莫斯科时期、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并做了系统研究。该研究不仅能让当代译者了解张闻天的卓越贡献，也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及翻译史的研究。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于林语堂翻译原则和策略的研究。作者朱嘉春主要考察了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针对其中的专有名词和通用词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技巧。通过彻底的统计与研究，朱认为，作为通晓两国文化与文字的译者林语堂具有一种文化间性，这使得他在读者接受度与文化传译度之间取得了最佳的平衡，从而保证了其译本既能在西方获得认可，又能在国内流传至今并广受学界关注。朱嘉春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中庸之道，或可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理性之路。

本集刊的最后一个栏目研究生沙龙是为了培养翻译专业硕士生学术写作水平而增设的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栏目。目前，硕士教育渐有“重专业，轻学术”的苗头，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生的学术素养有待加强。和国外的硕士培养目标不同的是，我国的硕士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比较牢固学术基础的高素质人才。而只有通过高效的引导和学术训练，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才能得到提高。遗憾的是，目前为硕士研究生提供的畅所欲言的平台和机会相对较少。为了响应国家“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号召，秉承“发名家之声，同时提携后起之秀”的传统，本集刊特为广大硕士生开辟出一片展现独立思辨能力、表达独到学术见解的新园地。

从本集刊选登的主旨发言和论文不难看出，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外译已成为了当下翻译的热点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讨。本集刊也将继续关注这一主题，并特别注重刊登具有跨学科视角和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热切欢迎更多学界同仁赐稿，希望能有更多有深度、有广度的学术成果涌现。

最后本集刊编辑部还要感谢为本集刊出版付出极大心力和时间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刘细珍副编审以及本集刊的主编助理李文婕老师。

主编：罗选民

2019年6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v

“第三届国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主旨发言选登

林少华

文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以村上文学及其翻译为中心 1

吕 华

对中国文学外译现状的一点思考 12

张 翎

海外华文作家的特质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学外译浪潮中的位置 21

裘小龙

翻译与双语写作 27

[US] King-Kok CHEUNG

Jin Yong's Dyadic *Wenwu* Ideal via the Four Arts of the Chinese Scholar: Implications for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36

理论探讨

白立平

中国文化外译中的赞助人与专业人士问题研究 56

汪宝荣

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述评 68

案例分析

冯全功 刘佳盈

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改译研究

——基于《中国文学》期刊版和全译版的对比分析 79

曾 光

论语境中的修辞语和其翻译的不可能性

——以《四时之爱》的翻译为例 92

王巍巍 穆 雷

从翻译专业人才抽样调研报告看翻译人才培养 102

中译外研究

梁燕华

文化记忆视域下的海外汉学回译研究 117

苏 鑫

译介学视角下区域文化对外译介研究
——以沂蒙文化为例 128

周成龙 崔司宇

“走出去”语境下的译介主体之争
——从两位知名翻译家的论战谈开去 136

译者研究

杨文地

翻译中的源语阅读语境移植：丹尼尔·贾德纳《中庸》英译研究 150

费小平

口笔译双料翻译家张闻天 170

朱嘉春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中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实证研究与
跨文化阐释 183

研究生沙龙

罗选民

主持人的话 197

陈绪凯

“化境”论与《三字经》马礼逊英译本研究 198

李 婕

穿梭于三度空间的典籍翻译
——以《洗冤集录》为例 203

查 娜

典籍翻译、现代语言与文化传播 208

陈慧莲

清末民初时期小说翻译的叙事建构 212

文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村上文学及其翻译为中心

The Role of Style 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entering on Haruki Murakami's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林少华
LIN Shaohua

摘要:

文体不仅是语文修养、语言技巧和语言艺术的表现,而且可能是作家对生活以至世界的一种个人化领悟方式。村上春树的文体不同于当今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形成了独特的“村上体”。笔者以村上文学及其翻译为中心,通过讲述村上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探讨文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及比喻这一修辞手段在语言或文体中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翻译的原则应为审美忠实,因此对文体的忽视也意味着审美视角的缺位。

关键词:

文体;村上春树;翻译;文化传播;审美忠实

Abstract:

Style does not only involve literary qualities, writing skills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s, but also manifests a personal way of understanding life and the world. Murakami's writing style is unique comparing with that of any Japanese writer nowadays and is thus known as "Murakami style." Centering on Murakami's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ole of style 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by narrat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Murakami's novels in China and illustrates with examples the unique role of metaphors and similes in literary styl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hould be aesthetic faithfulness so that the neglect of style in translation also means the absence of aesthe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style; Haruki Murakami; translation; culture communication; aesthetic faithfulness

我没有学过传播学。但传播的重要性我以为我还是大体知道的。尤其在当下信息社会,说绝对些,没有传播,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个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

传播。假如没有 1000 多万册拙译村上作品的传播，没有报刊专栏刊发我的“豆腐块”文章，没有新浪微博 300 多万“粉丝”，那么毫无疑问，多少有些存在感的我就不存在。至少，广外罗选民老师就可能想不起来邀我参加今天的盛会，我也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向诸位讨教。

对了，关于传播，日本文学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借出场人物之口这样说道：文明就是传达。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就是零。需要表达、传达之事一旦失去，文明即寿终正寝：咔嚓……OFF。这里，“传达”一词完全可以置换为“传播”。换言之，传播就是一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胫而走、沉默是金、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美好时代有可能已经寿终正寝：咔嚓……OFF。

即使植物也不例外，比如蒲公英。假如一棵蒲公英不开花结籽，如果它毛茸茸的绒球上的一把把小伞不随风传播，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世界上将只有一棵蒲公英，而这棵蒲公英迟早也将消失。所以，今天就传播讲点什么，对于我当然是一件很荣幸、很让人激动的事情。只是，“从文化传播看文学创作、翻译与评论的互生与互动”这个论坛主题实在太大了，超出我的想象力。因此只好弃大就小，仅以自己相对熟悉的村上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小点敷衍了事。也就是说，林海草原、杂花生树之间，我只撷取一朵蒲公英吹散它的绒球，和大家一起注视和跟踪它飞扬的形态和轨迹，从中提取传播学或非传播学等方面的意味和信息。并且，我想把村上文学的传播或者它的“被接受”原因聚焦于文体。也就是说，以村上文学及其翻译为中心，讲一下文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座的诸位想必都晓得，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很火。在日本火，在世界火，在中国可能尤其火。截至去年 12 月末，仅上海译文版拙译 42 本村上作品总销量就已超过 1000 万册（1056 万册），加上今春印行的《刺杀骑士团长》（80 万册，40 万套），今年肯定达到 1100 万册。一般认为，每本书有四个读者。这样，村上作品的中国大陆读者就在 4000 万上下。这可是一个相当不容小觑的数字。前不久武侠小说高手金庸先生去世，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关于村上，不妨说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村上。

为什么村上文学能在中国如此大面积传播呢？个中原因，一般读者也能说出若干。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我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也说得不算少了。比如把玩孤独，比如小资情调，比如为了灵魂的自由，比如失落与寻找、记忆与历史，比如政治抗争与社会担当或者“高墙与鸡蛋”。但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村上的文体。不言而喻，作为小说作品，哪怕故事再有趣、人物再典型、立

意再高明，也都只能依赖语言以至文体这一载体。说到底，创作也好翻译也罢，大凡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

一般认为，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要素之中，语言风格或文体特色是最难形成且最难改变的，它是作家的胎记和身份证。文体并不仅仅是语文修养和语言技巧、语言艺术的表现，而且可能是作家生命姿态本身，是作家对生活以至世界的一种个人化领悟方式。在日本，对村上文学的主题、结构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可谓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在语言风格、文体的独特性上面得到了一致公认，甚至认为他有“若干发明”。是的，村上的文体不同于当今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形成了独特的、难以模仿的“村上体”。这也是我今天尝试从文体角度切入论坛主题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小说家比比皆是，而文体家则寥寥无几。文体家必须在文体上有所创新，用独具一格的表达方式为本民族语言，尤其文学语言，做出经典性贡献。记得木心曾说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他还说，“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鲁迅祭》）。2012年先于村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文体方面就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他还表示：“我对语言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他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文体。”没有获得诺奖而文学影响未必在莫言之下的王小波关于文体也有极见个性的说法。他说：“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一样重要”。并进一步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材，“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相反，对于恶劣的文体，他比作光着上身的中年妇女。他具体是这样说的：“大约是在1970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热，晚上更热。在旅馆里睡不着，我出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而中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恶劣的文体（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

说回村上。村上特别看重语言和文体。他刚一出道就一再强调“文体就是一切”。他说：“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我就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如此轻视文体（Style）。”出道二三十年后他还是不忘强调文体：“（获得世界性人气）的理由我不清楚，不过我想恐怕是故事的有趣和文体具有普世性（universal）渗透力的缘故。”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之所以获奖，其主要原因是较之故事也更在于语言和文体。例如一位名叫吉行淳之介的评委评价

说：“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不言而喻，“没多费笔墨”即惜墨如金，即意味着简洁；“微妙的意趣”，换个说法就是幽默。与此同时，村上还分外重视文体的节奏。他说“我不会演奏乐器，……但我有想演奏音乐的冲动。既然如此，就像演奏音乐一样写文章好了——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且这种心情至今仍在持续。这么着，我总是一边敲键盘，一边从中寻找正确的节奏、相应的旋律和音色（正しいリズム、相応しい響きと音色）。那对我的文章是恒定不变的关键要素”（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 P124）。他说他的志向就是“想用节奏好的文体创造抵达人们心灵的作品”。这样看来，简洁、幽默和节奏感构成了村上文体的三大特色。而这样的文体或语言风格，其本身即可叩击读者的审美穴位、心灵穴位，而不屑于依赖故事性。

限于时间，下面只找几个比喻例句一起品味一下村上文体“微妙的意趣”或幽默。

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三条腿的狗。

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橡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

她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

万里无云的天空，犹如被切去眼睑的巨大眼睛。

嘴角浮现出俨然出故障的电冰箱的怪诞的微笑。

（他的双眼）如冬天忐忑不安的苍蝇急切转动不已。

自己的太太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的场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总是去而复来。就好像失去归宿的魂灵始终贴在天花板一角监视自己。

怎么样，这些比喻有“微妙的意趣”，足够幽默吧？当代老作家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比喻无疑在语言或文体中有独特的作用。余光中甚至说“比喻是天才的一块试金石。（看）这个作家是不是天才，就是要看他如何用比喻”。那么，村上是如何用比喻的呢？仅就这里的例子来说，至少有一点不难看出，村上用来比喻的东西起码有一半是超验性的，因而同被比喻的经验性的人或物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距离，而微妙的意趣恰恰蕴含在距离中。如宾馆和三条腿的狗、人生与松鼠、耳轮和钞票、天空与眼睛、嘴角和电冰箱、月亮同孤儿、妻子跟人上床的场景同失去归宿的魂灵……二者的关联有谁实际见过、感受过、经验过呢？也就是说，从经验性、常识性看来，二者之间几乎毫无关联。而村上硬是让它们套上近乎，缩短其距离，从中拽出一丝陌生美，一缕诗性。在小说中，诗性有时候也可理解为意趣、机趣、情趣、风趣。必须说，这正是村上文体或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

上面说的超验性，中国藏族出身的小说家阿来去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有一段

相当不错的表述：“其实一个作家好与不好，对我来讲，首先就是语言能力，写出新的语言质感的能力。这方面有个误区，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把写得特别顺畅当成一种功夫。结果造成了很多过于平顺以至于油腔滑调的语言。这个相当令人讨厌。文学不能只是叙事忧物，文学语言的标准也不仅仅是生动凝练之类。语言还有更强的功能，更高的目标。不光是呈现经验，复制经验，而在依靠语言，创造出新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审美意义上的，是生命意义上的——也就是所谓哲理、启喻。”与此相关，阿来还对以下现象表示担忧：文学评论大多集中在文本意义上的阐释，而对文本依赖的语言几乎不做真正的研究。而过度地在社会学意义上探寻文本的价值，有时反而造成文本的苍白与空洞。阿来最后强调，“对写作者来说，真正的，甚至唯一的问题依然是，他必须创造一套新的语言，找到一套新的表达方式”（参阅《语言的信徒——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演讲》，载于《散文选刊》2018年3月上半月刊）。

细想之下，村上的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持续走红二三十年，除了故事有趣，还在于文体的力量，恕我再次引用村上的原话，就是“文体具有普世性渗透力”。可以说，文体的力量也就是“文”的力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恕我武断和失礼——而我国之所以没能产生村上春树那样有全球性传播力的作家（村上作品外译语种在2015年已超过50种），甚至在中国本土大面积传播的纯文学作家也并不多见，原因固然许许多多，但我们的作家还没找到新的、有独特质感的语汇或文体来表达这个新时代的新感受至少是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仍在沿用老套的、用得烂熟甚至“油腔滑调”的语言和文体进行写作，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感受分离”。于是村上“乘虚而入”，进入这样的错位空间，满足了以城市年轻人为主的众多读者的文学审美感受和新型娱乐消费的双重需求。

是的，文体这一文学特有的艺术形式似乎被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突飞猛进的时代冷漠很久了。何况这又是个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应该说，在海量音像信息和网络写作的冲击之下，语言逐渐失去了严肃性、文学性、经典性、殿堂性和诗性。用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的话说，“开放的社会最不缺的东西，或许就是语言了。……语言太多了，好语言太少了。”换成我的说法，人们往往只顾说、说、说，而忽略了怎么说。说、说、说，也许能说成小说家。而若忘了怎么说，就产生不了文体家，就不会有人开一代文风、领一代风骚。结果上面的情况出现了。而村上不同，村上毫无疑问是一位文体家。我这个译者的贡献——假如我万一有这玩意儿的话——应该说主要不在于转述了一个故事，而在于引进了一种文体，一种独具一格的村上式文体。套用木心评价鲁迅文体的说法：读村上文，未竟两行，即可认定此乃村上君之作也！就我去年这个时候翻译的《刺杀骑士团长》来说，这部译成中文大约50万

字的村上最新长篇，据我获得的极有限的可靠信息，哪怕极保守地估算，每个字、每个逗号都值 25 元到 30 元。花这么大的价钱，花天价，如果单单买来一个故事，你说值得吗？肯定不值得。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或文体，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感受，从而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表达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启示性，那么无论天价还是地价就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在根本上取决于中文译本，也就是取决于翻译。我相当固执地认为，一般翻译和好的翻译的区别，在于前者转述内容或故事，后者重构语言风格或文体之美。通俗说来，前者主要讲故事，后者再现讲故事的调调。

而我的翻译——“林家铺子”译本的特点，别怪我总是老林头卖瓜自卖自夸，可能就是创造性地复制了村上原作的调调——搭眼一看就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一看就知是村上而不是井上、河上、川上，不是渡边淳一，不是东野圭吾。再次不谦虚地说，这大概是拙译比较成功的地方。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小说家张生曾说“林老师以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了现代汉语”，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但拙译有可能给现代汉语的艺术表达带来一种启示性这点，恐怕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不妨说是我为丰富汉语语料库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本雅明《翻译的任务》中的以下说法也给予我的这种努力以莫大鼓励。他说：“翻译绝不只是两种僵死语言的简单转化。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文字形式中，翻译承担着监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自己语言的生产阵痛的特殊使命。”

进一步说来，对于文体的忽视也是审美视角的缺位。别的且不说，仅就文学、文艺层面而言，恕我武断，我觉得近 70 年来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少谈美，个别时期甚至闹到了谈美色变的地步，把美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标志、无产阶级的敌人。相比之下，大多时候不是过于谈政治就是过于谈市场、谈钱以至谈性。总之就是不谈美。常言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看未必。用个稍微专业些的表达，文学三大功能，唯独审美功能差不多被置之不理，你说怪不怪？不光中国，据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介绍，美国也不例外。“前些年，美国学院中人大都不谈审美、文学性以及形式感等，怕被讥为保守或落伍。弄到最后，‘谈文’几乎变成了‘议政’，表面上很深刻，实则自毁根基。长久下去，文学批评（研究）将失去存在价值”（参阅《读书》2017 年第 8 期）。文学如此，文学翻译也是如此。借用许渊冲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我们谈尤金·奈达、费道罗夫、雅可布逊、巴尔胡达罗夫，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在文学地谈西方语言